

## ■ 玉渊杂谭

## 谁害死了无辜的海星？

主题为“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”的2015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在即，而“社会”行为似乎并未表示出对博物馆良苦用心的感恩回应——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不足一个月，海水触摸池里的海星被摸死，科莫多巨蜥模型脚趾被折断，引来又一场关于素质问题的讨论，更有网友戏称如果博物馆展出的是海星模型和科莫多巨蜥活体，大概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

“素质低”就像万金油，总能被用作解释所有令人愤怒而又苦笑无解的现象。但大多数人不愿简单承认“素质低”这一事实，喜欢找些看似合理的出口来模糊真相。

例如这次对上海自然博物馆管理方式的讨论就显得有些“没良心”，活体养殖区开放，客流量大似乎成了游客无序之顺理成章的理由，进而把海星的枉死最终归咎于博物馆管理不善，实在牵强。

记得去卢浮宫的时候恰逢十一黄金周，大量中国游客的“涌入”使得宫里有如菜市场。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博物馆一致，卢浮宫的大部分展品并无保护罩，只是在四周围上一圈低矮的护栏，也未见“五步一岗”的安保人员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即便在这种有些杂乱的环境下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有序，自发地形成了一种自觉，我甚至怀疑这种自律与讲解员一句轻描淡写的友情提示关系并不大。而这其中中国游客占了大多数。

## ■ 桂下漫笔

## 邓之诚：另一种“民国范儿”

“布鞋院士”的走红总让我想起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来。上个世纪前半叶，邓先生在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做教授。当时，学生眼中的邓教授也是一副“扫地僧”的模样，他头戴瓜皮帽，严肃的脸上是一副黑框眼镜，身穿长衫，褶裆裤，脚蹬布鞋，裤脚还绑在腿上。和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“民国范儿”相比，邓之诚这副装束颇有些另类。或许因为这个原因，在这些年大行其道的“民国文化热”中，这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。

邓之诚早年也是热血青年，办过报纸，闹过革命，后来从社会回归校园，走上了治学之路。世人皆以陈寅恪任教清华为破格用人之美谈，但陈氏当时虽无学位，却已经吃了多年洋面包，对西人之学及其治学方式有极透彻的了解。而邓之诚没有留过洋，一肚子学问多半以传统治学方式得来。放在今天，不少大学动辄要求有海外求学任教经历，“土鳖”邓之诚想谋个普通教职都难，更别谈当教授了。幸好，邓之诚赶上了不拘一格的蔡元培。1917年，应蔡校长之聘，邓之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，当时，他年方30。此后，辗转多个高校，1931年开始兼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近代中国是个万物趋新的社会，邓之诚却“顽固”地做着自己喜欢的“旧学问”。凡是真正的学者，为学与为人总是融合为一，治学偏好往往影响着阅世眼光。沉浸于“旧学”的邓之诚，月旦人物、品评时事，独特眼光，自成一派，提供了观察民国的另一种视角。今天读来，耐人寻味。

1934年5月29日，邓之诚在日记中记下，从今天开始停阅《大公报》及《新北平》，每月可省下二元六角钱。他还说：“胡适虽力倡以白话作报，谓可普及人民。而不知报费之昂，穷檐矮屋中人，岂其力所能胜哉？”对新派翘楚胡适之，邓之诚历来看不惯，据学生回忆，他曾在课堂上讽刺胡适说：“同学们，千万要听明白，城里面有个性胡的，他叫胡适，他是专门地胡说。”但他能在一片“普及人民”的高调中，为“穷檐矮屋”里的“人民”算一算经济账，恐怕就不仅是新旧之派别成见了。邓之诚家用多，开销大，又有藏书和收买老照片的雅号，经济难免吃紧，常和学校就课酬讨价还价。1933年某日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因子家食指众多，允月加六十，共二百四十金。过此无可再商矣。以师道等于市道，卖菜求益，殊令人不欢。然拂袖而去，又似不情，且困难甚多，如此间债务，如移家费用，尚皆无出，因致进退维谷。”第二天，又记：“连日筹维无术，以月得二百四十，仅敷日食。儿女辈学费及所负借债无应付之法。内子不谅，催嫁贞女甚力，真令人束手。”学校既不肯提高课酬，又得不到老婆谅解的悲催生活，读来多么令人心酸，但或许也正是拮据生活的体验，才让邓之诚体会到那些“穷檐矮屋中”

人”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。

民国知识界新旧并立，总体上是新派学者掌握着话语权，但对于新派的不少做法，邓之诚都不太赞成，而且还抱有历史学家特有的忧虑。1935年3月8日的日记中，邓之诚写道：“报载许地山反对谈经谈话，谓经书只讲五伦，今除朋友外，四伦皆已打倒，故不须读经。”对此，邓的评论是：“其言固妄，然时人心理大抵与许相同。予意固且不保，何言于伦理，又何须乎打倒！”他还预言家式的说：“他日总有欲求读经而不可得之一日。”果不其然，这几年读经又时髦起来了，而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鸡汤中，想找一个真能“解经”之人，确实不容易，以此验之，邓之诚还真有几分先见之明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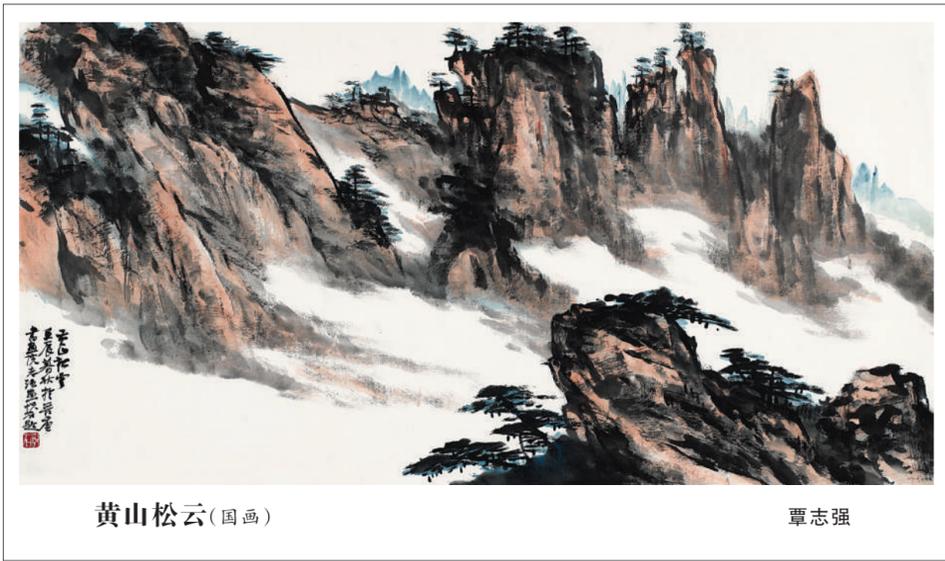
语言是思想的外壳，在趋新的社会，“新语”也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。文史大家邓之诚对文风变异尤为敏感。他曾简明而精当地描述了近代以来文风的变化：“新民丛报”文字一变，五四革新白话诗文再变，鲁迅译文体三变，今则俄文体四变。邓之诚所谓“今”，是新中国初期。当时，社会舆论包括那些曾经“民国范儿”十足的知识分子，已经熟练地使用“首长”“贯彻”这样的新词了。邓之诚却特立独行地保持着个性，对当时人喜用新名词尤为反感。他发现，报纸上“学生干部”所用文字，与通常语言有异。“几不可通耳”。邓之诚觉得，这是

## ■ 微科幻

## 魔鬼的天性

(美)弗雷德里克·布朗  
无机客译

亨利·布洛杰特看了眼手表，此刻已是凌晨两点。陷入绝望的亨利“啪”的一声合上自己一直在钻研的教科书，双臂交叉，低头趴在书桌上。他知道自己绝不可能通过明天的考试；他越是学习几何学，却越是弄不明白。对于他来说，数学一直是难以弄懂的学科，此时此刻，他发觉几何学是他根本不可能学会的。



黄山松云(国画)

覃志强

如果这次考试挂科，他的大学生涯就到了尽头；他在头两年里已经有另外三门挂科，今年再有一次不及格的话，按照大学的规定，会被自动开除学籍。

他非常想要大学学位，因为对于他所选择并为之努力奋进的职业生涯来说，大学学位是必不可缺的。现在唯有奇迹才能拯救他。

他突然有了个主意，猛然坐起身。为何不试试魔法呢？秘术总是让他着迷。他有介绍秘术的书籍，时常阅读上面的简单指南，比如如何唤出魔鬼，让它依从他的意志。至今为止，他一直觉得召唤魔鬼有点危险，于是从未实际尝试过。但眼下是紧急情况，或许值得稍微冒下风险。唯有通过黑魔法，他才能在一夜之间熟谙几何学。他迅速地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最好的黑魔法著作，翻找到正确的那页，记住他得要做的几件简单的事。

## ■ 人物纪事

## 周作人的挽联

他充满干劲地把家具都推到墙边，清出一块空间。他用粉笔在地毯上画出五芒星图案，跨入五芒星内，接着念出咒语。魔鬼长得比他预料中的模样更加可怕。但他鼓起勇气，开始解释自己所处的困境。“我的几何学一直学得很难。”他开始说起来……

“俺早知道了。”魔鬼快活地说道。魔鬼微笑着喷出火舌，越过地毯上毫无用处的铅笔线条，向亨利猛扑过来。原来，刚才亨利本该画出一道能保护他的五芒星图案，结果却错误地画了个六角星形。

对联语品种中，至为难作者为当属挽联。括死者行径、生者哀伤于区区两行，已是难为；况死生之大，死者为尊，若不欲一味颂颂，而于数十百字之中或暗寓褒贬，或指涉时局，则难上加难。到得现代，白话文起，挽联一道，已显式微之象，然余绪犹存，依然不乏名手。周作人即为其中之一。周氏晚年著《知堂回想录》，于一生所写挽联，间有记录，自然是十不存一，但已足尝其味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向请愿学生开枪，致死四十多人，酿成“三一八”惨案，这一天由此被鲁迅称为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。3月23日，北京各界举行全体殉难者追悼会，周作人致送的挽联是：

赤化赤化，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；  
白死白死，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。  
3月25日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举行刘

和珍、杨德群二君追悼会，周作人再送挽联：

死了倒也罢了，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间，亲朋倍信；  
活着又怎么着，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，弹雨淋漓。  
此两联以白话入联，非惟更显沉痛，亦愈显出和其兄鲁迅一般的“招抚见血”的犀利。此时距离周氏兄弟失和已二年余，然此两联直可与鲁迅先生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和《无花的蔷薇》两文互相发明。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数年，在政治、文化立场上犹取同一立场，同一步骤，互为奥援，此是一例。

1934年7月，刘半农至绥远调查方言，染上回归热，回北平不久病死，时在7月14日，年仅43岁。其时周作人正携夫人羽太信子游日本。回国后只赶上刘半农的追悼会，周作人的挽联是：

十七年尔汝旧交，追忆还从卯字号；  
廿余日驰驱大漠，归来竟作丁令威。

不仅没有什么成本，反而谁素质更低谁就能占到便宜——你跟海星照相了我凭什么不能照；你掰了蜥蜴脚趾我不掰一下就吃亏了。在世人皆无敬畏之心的氛围下，首先没有一种制度对所有“素质低”行为进行有效约束，那么任凭博物馆工作人员喊破喉咙，也拦不住来势汹汹的“熊孩子”和“素质低”的家长。至于频现于媒体上的各种口号式呼吁，就更像一种“素质低”事件发生后的仪式。

对于这次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海星死亡事件，各方居然都找不到问责的出口，这一点让无辜的海星何以“瞑目”！

文·杨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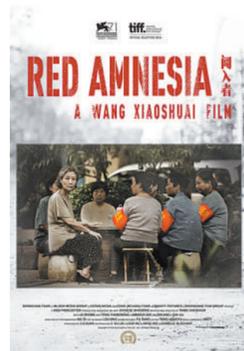
文·胡一峰

“变易之际”的表现。他说：“昔人为文，唯恐辞费。今则唯恐辞之不费，故丰收而曰大丰收、特大丰收。鼓劲而曰鼓足干劲、鼓更足干劲，言无穷而意有尽矣！”反观今天见于报章之官样文章，所谓鼓掌没有不“热烈”的、接见没有不“亲切”的，邓之诚“言无穷而意有尽”的批评可谓依然有效。

与新社会的隔膜，使邓之诚在纷扰的学术热点面前保持了冷静和定力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史学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，各路高手纷纷登场，争论不休，好不热闹，邓之诚却视之为“群盲道古图”。在写过《中华五千年史》的他看来，“中国史不容划分时代，更不容划分社会”，用西方包括苏俄舶来品理论裁剪中国历史，必将导致对中华文化的打压。对当时一些人摒弃本土文化的做法，邓之诚痛心又无奈。1954年2月26日，他在日记中感叹道：“今之大学生知有孔孟者，亦罕矣！再过数年，虽咕嗒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。”

又过数年，“大跃进”浪潮汹涌而至，邓之诚有些感伤地说：“今时人目正经、正史皆为材料，我辈所述更无论矣！四十年前，则以经史为旧，以科学方法为新。我辈稍读旧书，始则见其于方法，继则见其于主义，二者皆自外国输入，总之见其于外国而已。从来斯文扫地，未有如近数十年之甚者也。”两年后，邓之诚在落寞中走完了他作为中国文化体悟者而非旁观者的一生。

## ■ 影像空间



作为被强行命名却风格迥异的一代，“第六代”导演自诞生之日起便有着驳杂多元的创作面目。但与怀有宏大叙事与文化反思抱负的“第五代”导演相比，他们仍有一些共通之处：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观照与个体生存境遇的同情。与前辈们乐此不疲地重述历史、建构寓言，将历史视为“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”的勃勃野心相比，以“日常化”、“私语化”为标识的“第六代”导演总是对历史怀有一种作壁上观的姿态。即便在进行历史叙事时，也总流露出一种冷静、疏离的意味。

在张艺谋的《归来》之后，王小帅的《闯入者》的出现再一次显示出两代导演之间文化立场与叙事风格的差异。同样面对十年浩劫创伤所造就的“历史失忆”这一议题，《归来》是以热烈的姿态重回与重建历史，《闯入者》则是以冷峻的姿态回望与召唤历史。

毋庸讳言，现代化进程汹涌、后现代文化蜂起的当下中国是一个历史失重的时代，我们被这个历史感破碎的平面化时代所裹挟而无法逃脱。正如弗雷德里克·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，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愈薄弱的历史感，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，而另一方面，我们个人对“时间”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褪而有所变化。于是，在一个无力把握现在又不能回归过去的时代，玩弄历史的碎片成为一种潮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如果说《归来》迎合了当下愈演愈烈的怀旧风潮，在历史反思的旗帜之下大肆抽离历史真实的影像进行怀旧消费的话，那么《闯入者》从当下进入历史的独特叙事方式则显露出真切的历史反思姿态。于是，在一个患有“怀旧病”的时代，《闯入者》就如同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，似乎注定无法在大众口味上与《归来》相提并论，当然更无法同《左耳》、《何以笙箫默》等消费青春的影像相抗衡。尽管影片以“悬疑片”的面目，做出了趋近大众审美的努力。

表面上看，《闯入者》涉及了不同的表达主题而显得破碎凌乱：历史带来的遗留症、空巢老人的生存状态、两代人之间的伦理冲突、拖欠工资的社会问题等等。实际上，这些都以主人公“老邓”的家庭为联结，以家庭伦理的书写而展开。而家庭伦理的建构背后，显然是“历史的幽灵”作祟。《闯入者》讲述了不同层次的“闯入”：物理的与精神的。老邓一次次地闯入儿子的家、老赵的孙子闯入老邓的家，这是物理层面的闯入。而就精神层面上而言，则都遥遥指向着“历史”的闯入。

《闯入者》：  
历史的幽灵

文·李宁

戴红帽子的男孩在影片中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符号。他寓意明显的“红帽子”以及他的讷讷寡言背后，矗立着巨大而沉默的历史身影。他的出现正如影片的英文片名——红色健忘症(Red Amnesia)所点明的那样，整个时代患上了一种历史健忘症。这种健忘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遗忘，而是对历史教训的遗忘和反思精神的匮乏。

影片中，老邓以专制跋扈的姿态一次次闯入两个儿子的生活，大儿子自以为是的立场拖欠工资，这些何尝不是他们没有觉察的历史幽灵？影片中，老邓两次旁听老年人集体唱红歌，第一次听到之后心有不舍地转身离开，第二次则似乎恋恋不舍地向内张望。这两个段落是别有意味的，展现老邓对于那段历史既有负罪感同时又有一丝向往的复杂心态。而历史在上代人身上铭刻的痕迹，会自然地延伸到下一代人身上。当大儿子向弟弟口述母亲的往事，似乎注定无法在大众口味上与《归来》相提并论，当然更无法同《左耳》、《何以笙箫默》等消费青春的影像相抗衡。尽管影片以“悬疑片”的面目，做出了趋近大众审美的努力。

乌托邦陨落之后，诗人北岛曾在《回答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冰川纪过去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？”这一诘问仍然需要时时响起。因为在历史失重的年代，我们更需发现身边游荡的历史幽灵。而这，恐怕便是《闯入者》的意义所在。

文·丁辉

常及尔时出人民报社之人物，窃有开天遗事之感，今并此绝响矣。”龚宝莹即龚未生，后为太炎女婿；“家树人”即其“家兄”鲁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兄长的鲁迅有一点和作人不同，除1902年有一副“挽丁耀卿”的挽联外，鲁迅似乎很少给人写过挽联，翻遍鲁迅全集，也未曾找到第二副，和几乎是逢亡必挽的弟弟作人恰成对照。其中个人性情、气质的缘由不再赘述；此歧义逻辑上自然有，而事想说的是，几乎没人写过挽联的鲁迅死后追悼会上，各界人士所送挽联多到不可胜数，遂使鲁迅成为死后获挽联最多的现代作家；而一生写下无数挽联的周作人于1967年去世，不要说挽联了，连最简单的追悼仪式也没有。正以此故，笔者明知文题“周作人的挽联”易生歧义，可有“周作人写的挽联”与“挽周作人的联”两义，也不再赘述；此歧义逻辑上自然有，而事实上却不会有或不应有，因为“挽周作人的联”原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物事！

于病逝前一年在北大开讲顾炎武(亭林)诗，然“差幸免作顾亭林”一句妙处在暗涉时局。时日寇步步紧逼，国运一息尚存，遂使得黄节饶幸免做民国遗民；若联系当时危若累卵的国家处境及周作人对战局的悲观，周氏眼中的黄节之死可谓“死得其时”。此种忧惧心态或可为周氏后来的附逆下一注脚。

1939年，钱玄同病逝。时北平已沦陷，北大已南迁，周作人与钱玄同同所谓“留平教授”。周作人的挽联是：

戏语竟成真，何日得见道山记；  
同游今散尽，无人共话小川町。

钱玄同与周作人初识于1908年，在东京民报社同列太炎门墙，听章太炎讲《说文》。同学者除周作人钱玄同外，尚有鲁迅、朱希祖、朱宗莱、许崇清、龚未生、钱加治、共八人。周作人1939年4月28日《玄同纪念》中写道：“同学中龚宝莹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歿，朱希祖许崇清现在川陕，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。每来谈